



历史细节

从研究母亲的历史开始

□叶汉明

当舆论强调母乳哺儿的强国强种作用时,正值牛乳东来之际,奶粉商遂以科学和文明话语推销牛乳,强调这种重视营养和卫生的科学化育儿法有强国强种实效,终令奶粉打进中国市场,牛乳哺育得在中土萌芽滋长。

《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一书对洋商来华与牛乳传入、销售、宣传推广、消费等方面的发展,言之有据,内容扎实,足见作者多年治牛乳东来史的根基。不过,作者措意所在乃母亲角色和经验的转变。作者指出,从母亲的故事中其实很难清楚看出她们选择以牛乳哺婴是为了强国强种等宏大理想。日常生活上的安排、消费模式、商品化和市场化等现代性的影响因素可能更显而易见。所以“强国强种,良母有责”等针对母亲的规训,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及柴、米、油、盐和衣、食、住、行等细节和繁琐家务,以致对家中老幼的关怀照顾工作来得贴身,即使作为看顾者的家庭主妇,她们并无太大的选择自由。

故本书“母亲的抉择”一章所详述的个案各有特色。当中的母亲都选择牛乳育儿,但形象不一。当时中国的母亲类型也很可能不以作者论文中所总结的三种——贤妻良母、在职母亲、“摩登”母亲——为限,而作者所挖掘的案例数目有限,它们是为了弥补民国社会调查资料的粗疏缺陷而被采用的。可幸作者对这些个案述之甚详,尽量呈现有关这批母亲的文字叙述内容。它们有母亲所写的育婴日记、自白文章或他人对她们的记述如采访文字及文学作品,也含少数父亲的随笔在内,约十数篇。

从本书作者的铺陈可见,这批文字的内容其实颇翔实,涉及的课题也很多样化。其中包含的个案有为革命而将哺育和照顾婴儿的责任交托于乳娘或家人的丁玲;也有同是五四成长的新一代小家庭中的年轻父母,他们为夫妇同就业、共育儿的理想而努力。但个案中的覃英及其夫鲁彦却受到不少意想不到的挫折,二人所合著的《婴儿日记》流露出新时代的在职女性不必为生儿育女而断送事业的期许,可采之法是乳母的雇用或牛乳哺育。例如覃英因有工作而又缺乳,故用牛乳哺儿,又聘用佣人照顾长子。然本书作者细读《婴儿日记》后,发现它不仅载录了覃英夫妇在理想难以完全实现方面的挫折,从字里行间又可窥见作为五四成长的新一代的女主人本身备受各种客观和主观局限性的影响,如儿子健康问题令家姑不满牛乳哺育;甚至连丈夫在她离家工作时留家带孩子都会令她内疚不已。作者以前者为长辈的压力,与父权家长制有关;后者则为覃英对家庭、丈夫和儿子的责任感所产生的自责心和负罪感,因她“骨子里仍深受传统男外女内的性别角色影响”。在前两者结合的压力下,她遂在第二胎出生后回归家庭,歉疚心更令她思索“如何做个母亲”。

传统意识和罪己的愧疚心亦出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出版的另一个文本《母亲日记》中,可见母职与事业间的矛盾,以及罪疚感常是最磨人的情绪。主角绿萍也坚信育儿是母亲的“义务”,为了让自己可以抽身工作,她得先自行妥善处理好育儿问题。结果她得靠两位乳母兼佣人、母亲、嫂嫂等的帮忙,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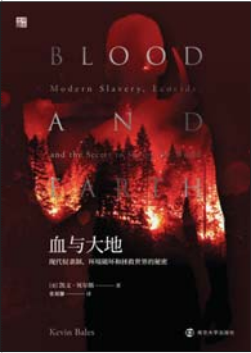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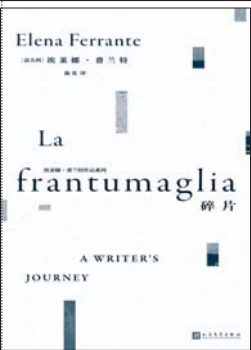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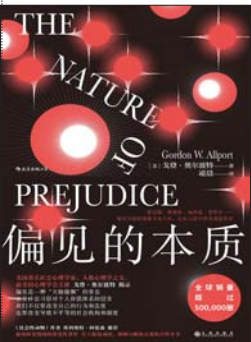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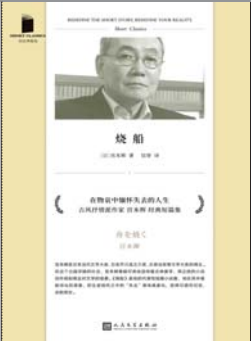
《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
卢淑樱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能进入职场。本书作者除批评绿萍的育儿是母亲个人义务的观念外,也指出民国舆论避而不谈的是在全无政府或社会支援的情况下在职母亲的有限资源问题。个人能有足够资源者,相信只有少数中的少数。双重或多重负担常令新女性的独立自主梦想难以实现,这又何尝不是于今犹在的现象呢?

五四后的新女性从求学到就业之路是曲折的,三十年代就有“妇女回家去”的逆流,母职常是个借口。本书所引的母亲自白就有一篇题为《我回到家庭去了》的文字。吊诡的是,这位母亲为帮补家计而就业,到头来却因无法负担乳娘或雇人以牛乳哺婴的工钱而只得回家照顾幼儿。另一篇自白的作者则为了孩子而放弃学业,然心有不甘,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做一个“人”,而非只是妻子和母亲。短短的篇章充斥着无奈的唏嘘感。另一篇产妇见闻报道也提到一位母亲就有女人“一生了孩子便什么都完了”的无奈叹息。

在各种母亲哺儿的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信是哺母乳给母亲所带来的难言痛楚。和经痛、产痛一样,哺母乳之痛是女性所经历无法形容,或难以言宣之苦。为人母者对此大多索性闭口不谈,默默忍受,视之为理所应当。

民国时期的媒体还记载了少数较富裕的“摩登”母亲可雇用奶妈代劳哺婴,并代她们承受哺乳之痛。本书作者对民国母亲的分类,就有一类叫“摩登母亲”的,而当时被视为“摩登女性”必读的《玲珑》等杂志就常登载这类现代时尚女性的特写,也报道新型的“快乐小家庭”和“摩登母亲”的闲适生活状况,再现了现代性的魅力。然同时出现在其他民国媒体(尤其是左派报刊)上的对“摩登母亲”百无聊赖的少奶奶型生活的非议和负面论述也不少。可见在那个转型的时代中,母亲形象其实殊相杂陈,不一而足,令我们联想到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大师琼·W.斯科特对“经验”的特殊看法,她从后结构主义和后本质主义视角,质疑一般被视为证据和知识根基的经验的权威性批判将经验过分通概化和本质化的倾向,认为个人经验不是固定的,要理解它的历史性、时代性、阶级性等性质,故常须将它放在脉络中去分析,这就涉及她“将经验历史化”的理论。她主张我们所着眼的该是建立主体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经验本身。是由是,我们不能忽略经验与角色要求之间的关系,以及经验和主体性的社会性和时代性。



著作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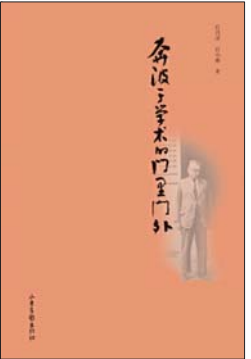
□石兴泽

傅斯年生活在国势严峻、民族危难的时代。他坚持“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的人生观,“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并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肩负起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但个体生命的能量是极有限的,“过量热心”的劳作摧垮了他的身体。他虽知“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是“夸大狂”的妄想,也知道需要“养元气”,却每天过度燃烧生命热量,“挖山”不止。由此决定了人生悲剧:他只活了55个春秋,留下无尽的遗憾。

这当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民族国家的苦难决定了他的命运,而他的性格更促使个体生命向着终端高速前进。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但谁能说傅斯年的悲剧仅仅是性格造成的? “国家有难,义同征兵”,生活在离乱时代,哪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承担着民族国家的义务和责任? 傅斯年的悲剧在于承担得太多,生命无力承受其重!

傅斯年的悲剧命运是极其丰富的话题,思想文化界曾做过很多深刻生动的解读,昭示了很多重要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时代警示意义。在此我们谨就他与师友的交往进行梳理。这项工作做了很多年,开始拟定的题目朴素质直——“傅斯年的圈子”。有编辑善意地提醒:慎用“圈子”,以免造成负面影响。但书稿既成,笔墨始终围绕“圈子”游移,长途跋涉近十载,已经没有力气推倒重来,思来想去改成现在的书名。

傅斯年的人生如他所说,在学问和政治的“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他一生轰轰烈烈,留下了



《奔波于学术的门里门外:傅斯年师友交往录》
石兴泽 石小寒 著
山东画报社

新书秀场

《烧船》

[日]宫本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本当代文学家宫本辉的短篇小说集。宫本辉认为好的短篇小说要像水一样,“水随器物而有形”,失去自己的状态,只会根据喝下它的人,显得或浓或淡。《烧船》中的七篇小说中,作者借助诗化的意象,比如海上的明月、沙滩上的覆舟、丈夫胸口的气息等,把生老病死之中的“失去”意味具象化,变得可感而可悲,余韵悠长。

《偏见的本质》

[美]戈登·奥尔波特 著
九州出版社

心理学界曾普遍认为“偏见”只是个别的、品德有缺陷的个体所持有的恶劣信念,只要大多数善良的好公民与这些“害群之马”划清界限,就可以把偏见的影响降到最低。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以雄辩的论述和大量来自实证研究的数据证明了,偏见要比人们想象得普遍很多,偏见是“大脑偷懒”的常态,也是社会习俗对个人价值的侵害,消除偏见不仅要改变个人的行为态度,也要改变导致不平等的社会机构和制度。

《碎片》

[意]埃莱娜·费兰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作者真实身份至今是谜。2011年至2014年,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贫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世纪的友谊,尖锐又细腻地探讨了女性命运的复杂性和深度。《碎片》是埃莱娜·费兰特20余年来的书信、访谈和散文集。作家在书中袒露了自己对写作风格和主题的探索历程,并回顾了自己经历的自我怀疑和突破,这些对话睿智地诠释了女性和家庭、神话和文化、城市和记忆,以及作家和读者的复杂关系。

《血与大地:现代奴隶制、环境破坏和拯救世界的秘密》

[美]凯文·贝尔斯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奴隶问题研究专家凯文·贝尔斯考察过无数危险的奴役活动现场。为了确证奴役与环境破坏之间的联系,2007年贝尔斯深入令人窒息的矿山与酷热的雨林,去收集详尽的证据。他为我们带来环境危机和人权问题高发之地的骇人故事,展示了奴役活动显著加剧全球变暖的惊人证据,也带我们见识了产出我们口袋里的手机、餐桌上的鱼虾、身上的珠宝的残酷供应链——奴役和破坏支撑着全球市场,我们每天都吃、穿、用这桩罪行的赃物。

生命不能承受其重

悠远的历史回响。但从求学到留学,从研究到教学,始终生活和工作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的高端区域,师友交往比较简单。圈阔内大都是广有影响的儒林人士,浓缩了社会、文化、学术和教育的丰富信息。从这里看过去,将会读到影响现代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许多高端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朱家骅、蒋梦麟、鲁迅、陈寅恪、赵元任……性格心理的某些方面。

这里有惊心动魄的斗争,尖锐激烈的冲突,义薄云天的友谊,割袍断义的传奇,无论从密友到路人的变数还是从“欲杀之”到至交好友的翻转,大都公德私谊恩怨分明,爱恨情仇亲疏有据,原因结果内涵丰富,师友密友挚友诤友畏友,友友承载着时代风云,朋城内凸显着一个现代学人卓然不群的个性风采。

选择傅斯年师友圈阔的“点”颇费心思。有人跟他走得很近,但交往内容多是鸡毛蒜皮,梳理其间关系,既不能彰显现代儒林精神风貌,也缺少足够丰富的社会内涵,钩沉索藉,琐屑乏味;有的关系虽不密切,简单的交往却透露出时代文化的某些信息,显示出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某些方面;有的从哪方面说都可以入选,但天时地利都有障碍,也只好忍痛割爱。权衡各方面,我们选取这些师友进行耙梳。

我们将这些师友圈阔划分五类:师长,同学,同事以及政、学两界友人。由此构成认识傅斯年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五个经纬。窃以为,与社会舞台上的化妆表演相比,师友交往更能表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圈阔内交往是更真实、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影像。走近了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学人的五光十色,看到他们事业追求和文化心理最真实的内容。

傅斯年生活的时代是风云变幻、乱象丛生的时代,也是民族生死危亡、国家浴火新生的时代。傅斯年的师友圈阔承担了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重担,推动着社会转型和教育文化发展,是历史变革时期最敏感、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活动和交往辐射到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和层面,是值得回味历史存在。